



U 本科教学信息简报 第83期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ulletin

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编印

2009年3月2日



◆ 学院之窗

- ◆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国家特色专业本硕连读项目启动
- ◆ 我校教师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环境监测课程研讨会”
- ◆ 信息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专业实验室建设

◆ 高教参考：改革开放 30 年五个阶段的教育发展及其启示

◆ 校长论坛：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学院之窗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国家特色专业本硕连读项目启动

为了适应我国海洋渔业产业对高层次优秀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的需求,提升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的科技含量,支持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经过数年的精心准备和调研,日前我校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上海高校教学高地之子项目“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国家特色专业”六年制本硕连读项目启动。

为了进一步完善项目方案,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海洋科学学院2月15日在我校军工路培训中心再次召开了项目方案研讨会。会议由海洋学院院长许柳雄教授主持,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吴建农、校办主任张敏教授、研究生部主任施志仪教授及副主任冷向军教授等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人员还有海洋学院本科、研究生工作分管院长及海洋渔业教研室全体教师。

会议对学生培养模式、学生管理、教学管理、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讨论

海洋科学学院 海洋渔业教研室供稿

和论证,一致认为,该项目应着重培养精、宽、新人才,“重基础、重应用”,按“因材施教,突出个性发展”的原则组织教学,配备优秀教师任课,本科3年级始配备指导老师。专业方案宜打破现有做法,加强英语、数学、物理及计算机等基础课程教学,同时亦须强化专业课程和专业实践,理论课与实践课要均衡,在课程设计上要避免本、硕课程重复开设。会议建议海洋科学学院成立本硕连读计划实施领导小组,定期研究有关问题,并制定相关专业培养方案,可试点单独执行,并建议学校及各职能部门在政策予以优先照顾。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是我校为数不多的国管专业之一,近年来分别获得国家特色专业、上海高校教育高地、上海市及国家教学团队等建设项目,并曾多次获得国家、教育部及上海市教学成果奖,本专业六年制本硕连读项目的启动必将推动我校教学改革的深入探索和发展。

我校教师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环境监测课程研讨会”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工程教学指导分委会主办,东华大学承办的“全国高等院校环境监测课程研讨

海洋科学学院 黄宏供稿

会”在东华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三十多所高等院校以及上海市环保部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五十余名代表参加了研讨

会。我校海洋科学学院环境工程教研室的印春生、黄宏等四位教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来自一线的教师就环境监测课程内容、发展创新及教学方法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讨,我校黄宏老师就我校环境工程专业的建设状况、培养计划制定及环境监测课程的教学体会进行了交流,展示了我校环境工程专业的办学特色,并提请高教出版社推进海洋环境监测课程的编写,以推动涉海类专业课程的建设。本次教学研讨会推动了环境监测课程的教

学与改革以及相关环境科学与工程课程建设。研讨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设置的“奉贤区排水管理中心在线监测系统”。



信息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专业实验室建设

2009年2月17日信息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专业实验室建设,会议由黄冬梅院长主持。

会议首先对骆解民老师提出实验室管理方案框架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实验室名称、设置、管理模式、分工、岗位职责及招聘考核方式等内容。实验室名称定为信息学院专业实验教学中心。下设嵌入式系统与信息处理实验室、计算机组成原理教学实验室、微软软件综合教学实验室、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教学实验室、嵌入式系统与信息处理实验室和海洋信息与决策支持系统实验室等6个实验室。实行由学院统一管理,各专业系室派

信息学院 供稿

出专业教师和教辅人员参与管理的管理模式。在正常运行期间: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实验室教辅管理人员2-3名,每个实验室配备实验教师(兼职)1-3人。筹备期间:由沙荣方任主任,骆解民任副主任协调工作,下设筹备工作人员5-6名。实验室各个岗位人员,采取公开招聘,定期考核。

接着,会议就专业实验教学中心的运行及当前的日常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最后,会议提出:信息学院专业实验教学中心的起点要高,包括工作人员的责任心要高,实验室管理水平要高,实验教学质量要高。



高教参考

改革开放 30 年五个阶段的教育发展及其启示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杨银付

2009 年 02 月 09 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光阴荏苒，改革开放转瞬已 30 年。这 3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国小学净入学率从 1978 年的 94.0% 提高到 2007 年的 99.5%，增加 5.5 个百分点；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1990 年的 66.7% 提高到 2007 年的 98%，增加 21.3 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从 1990 年的 26.0% 提高到 2007 年的 66.0%，提高 40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90 年的 3.4% 提高到 2007 年的 23%，提高 19.6 个百分点。我国教育经费占世界教育经费的比例不到 3%，却支撑了这样庞大的教育体系和受教育人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30 年的教育改革发展大抵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重新确立教育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阶段（1978-1985）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与之相适应，对教育的认识也由“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发展到全面看待教育与社会

发展、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教育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重新确立。

一定程度上说，国家的改革开放始自教育领域，1977 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首先选择以推翻“两个估计”为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1978 年恢复高考，并恢复向外派遣留学生。学校教育迅速摆脱混乱局面，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1978 年 5 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解放了教育界。一场关于“教育本质与职能”的讨论拉开序幕。这场讨论或论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 90 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逐步促成了“教育既服务上层建筑，又服务生产力”、“教育既促进社会发展，又促进人的发展”这些基本共识。

随着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教育理论也逐步丰富和完善。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从社会主义的战



略全局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重视教育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反复动员全党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倡导尊师重教,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教育发展和改革纳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将教育确定成为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之一。此后的历届党代表大会,无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直至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二、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中等职业教育,改革教育体制阶段(1985-1993)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潮。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并成为指导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1985年的《决定》明确指出,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对此,《决定》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

在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决定》首次提出了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历史性任务,认为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基础一环。明确要求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放在我国教育发展的

重要位置。《决定》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选择。一是增加政府教育投入,明确提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二是坚持分类指导。三是坚持体制与机制改革,例如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职业教育领域,提出要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高等教育领域,则明确要求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四是组织保障,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

回顾23年前的《决定》,亮点有许多,而其最重要的亮点乃在于其精神:深入调研,找准问题,对问题讲深讲透,特别是指出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是教育工作中的最大弊端;解放思想,强调改革;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事求是。而《决定》简洁、直接的文风,亦为人们所称道,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也是改革勇气的体现。

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深化改革阶段(1993-1999)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成为指导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和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具体目标。为了实现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坚持协调发展,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办学效益,实行分区规划,加强社会参与”的发展战略。

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是高等教育各项改革中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成效最为显著的,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打破了过去“包分配”和“包当干部”的传统模式。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逐步建立了成本分担制度,实行普遍的缴费上学制度。

这一时期启动、展开了中央业务部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形式,包括共建、调整、合作、合并。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条块关系问题,二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三是政府与学校关系问题。这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解决得最好,部门办学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改变。原来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管理 367 所普通高校,改革后只有 111 所,且其中绝大部分为教育部直接管理,只有少数是行业主管部门管理。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好,改革不仅是“换婆婆”,更重要的是“解放媳妇”。受多种因素影响,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到的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问题至今未得到很好解决。

回顾历史,《纲要》中的三个亮点为人们所谨记:一是从实际出发确立了“低重心”的教育发展战略,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我国

90 年代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二是提出实施“211 工程”,集中中央和地方等方面的力量办好 100 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三是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求 2000 年达到 4%;同时提出社会各方面都应增加对教育的投入,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即“财、税、费、产、社、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阶段(1999-2003)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就是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教育担当起培养创新人才和民族复兴的重任。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成为指导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的提出和探讨自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但《决定》的颁布标志着素质教育



成为我国整个教育工作的主题。《决定》颁布后,素质教育迅速呈现国家推进、全面展开、重点突破的态势,在加强德育、课程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幅扩招的时期。其背景有增加高等教育机会、拓宽“独木桥”、为素质教育创造宽松环境的因素,直接的原因则是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从1999年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连续7年扩招,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增长,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快速增长,从1998年的850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700万人,年均增长13.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快步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

回顾历史,这一时期的教育,既注重提高质量,又强调加快发展特别是加快高等教育发展,其初衷是希望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拓宽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为素质教育的实施创造条件。但由于客观上扩招较快,如何进一步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以及之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也为人们所关注。

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同时强调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阶段(2003-)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就对教育领域提出了优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教育工作的重点,而促进教育公平也成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目标。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

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2007年8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统筹城乡、区域教育,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统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认真研究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更首次把教育列为民生和社会建设的第一条,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提高教育质量延续性地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又一个重点。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就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作出重要批示,素质教育再成热点。2006年,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素质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题。目前教育工作中,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仍然不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仍然薄弱,社会上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呼声依然较高。从教育内部来说,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全社会来说,素质教育的实施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教育内外协同长



期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促进我国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 30 年五个阶段的教育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良多:

1.30 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离不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不开教育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是 30 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灵魂和主线。今天,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仍应该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2.30 年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我国制定了比较适合自己国情的教育发展战略。一是坚持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二是确立低重心的教育发展战略选择,并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重心逐步上移;三是强调教育结构的丰富性,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四是坚持因地制宜,分区规划,分类指导,从实际出发确定战略优先选项;五是力求处理好教育发展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目前正在起草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考虑我国教育在新起点、新形势、新期盼下的发展战略选择,更加注重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进一步加强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结合,提高教育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贡献和知识贡献能力。

3.改革创新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 30 年是我国教育发展最快的 30 年,也是教育改革最深刻的 30

年,而且正是丰富而深刻的改革保障了教育事业宏伟目标的实现。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坚持抓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完善教育政策。例如,1985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革,为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宏大目标,根据当时国情,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国家调动地方发展基础教育的积极性,地方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这一次的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2001 年第二次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革,针对地区间第一次体制变革以来各地基础教育发展差距,提出以县为主。2005-2008 年新形势新任务下第三次变革,则建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实现义务教育政府办,并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4.坚持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在促进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推进教育公平。坚持从易到难、有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意在减少改革的阻力和降低改革的风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渐进式改革也造成新的问题不断积累,今天的改革已处于深入区。

5.30 年来,我国坚持优先发展战略的政治承诺是明确而坚定的,但需要进一步体现在公共教育投入上。30 年来,我国教育发展方面的目标基本上达到了,但是教育改革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其中一些方面因教育内外各方面的制约,长期未能突破。温家宝总理最近指出,教育体制亟待改革,教育水平亟待提高,教育投入

亟待增加。三个“亟待”，特别讲明了推动教育发展的紧迫性。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所要特别关注的。

6.30年教育发展的实践表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教育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以促进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科学发展。例如在对各级各类教育性质的认识上，要处理好公益和私益的关系，准确定位；在教育发展的目标上，要处理好数量与质量、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统筹兼顾；在教育发展的政策选择上，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促进教育发展，又促进教育公平；在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既要避免教育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又要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对教育公共服务的大包大揽；在教育决策主体与程序上，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好集中治理与分散治

理、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政府决策与利益相关人决策的关系；在教育改革的推进策略上，要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大胆进行试点，稳妥渐进推广。

3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最突出的成就，就是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我国现在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接受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与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必须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教育的优先发展、科学发展，既促进教育发展又促进教育公平。

校长论坛

[编者按]:

中国大学改革的二维坐标，在横的方向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极大地满足广大人民的学习需求；在纵的方向，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样一场整体性的演进中，大学教

育的方方面面都被提到改革和创新的议事日程详加考量。近期的“名校换校长”之所以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正是因为高校治理离不开校长等主要领导者的理念与智慧。我校在更名和搬迁之后，着力优

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编制 2008-2020 年发展定位规划。各学科专业如何围绕学校的发展定位规划未来发展,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适应自身发展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形势,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使得自身

得以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在此本报设立《校长论坛》专栏, 刊载中国名校校长之真知灼见, 以飨读者。

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一)

◎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刘道玉:

刘道玉, 1933 年 11 月生, 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 年, 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 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 至 1988 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 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 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 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教育学研究方面, 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先后出



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 10 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 150 多篇文章。1985 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 1987 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 1993 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 使武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创作的。2005 年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教育改革情结难消除。2008 年 2 月 26 日用一个“乱”来概括中国大学的问题。

.....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马国川

我被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潮头

经济观察报：你大半辈子都和武汉大学联系在一起。

刘道玉：我少年时的梦想是当一个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1958年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60年代初到苏联留学了一年半，结果被赶回来了。这改变了我的生道路，因为那时候适逢“反修”，周总理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我成为“反修战士”、“反修英雄”，被推到领导岗位上，结果文化大革命挨整，被关押、遭毒打。“文革”后被教育部借去当了两年多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那时候正值拨乱反正，工作繁忙，两年主持了24个会议。我累病了，于是借故辞职回到了武汉大学。到1981年夏，又被任命为校长。

经济观察报：当时的《人民日报》头版还报道了这个消息，称你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位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我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刘道玉：《人民日报》记者专程来武汉对我进行专访。我对他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必须发扬彻底改革精神，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要在武汉大学

搞改革？

刘道玉：解放前武汉大学是全国五所名校之一，解放后一度滑落到全国重点大学第22位。我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期间，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要选择5所大学，作为全国的“重中之重”。虽然我处处为武大说话，但由于它在科研上没有特色，成果不多，缺乏知名学者群，故而不能列入前5名。这在我内心里埋下了强烈的振兴武汉大学的愿望。

经济观察报：80年代初，改革已经成为潮流。

刘道玉：1980年2月，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改革的地位不断提升，旋即成了一切工作和国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他提出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话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的卓识和魄力，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表达了人民的意志，激励了亿万人民的改革热情。我就是被这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潮头，出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

经济观察报：有意思的是，当时全国有些大学在试行校长负责制，但你却说决不争当校长负责制的试点，等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实行了校长负责制，你才最后一个搞校长负责制。这似乎与你一贯锐意改革的形象不符。

刘道玉：我的确说过这话，虽然偏

激了一点，但都是真话。当时，教育部仍然实行“大一统”体制，一个大学校长没有调动一个教师的权力，没有批准建筑一平方米房屋的权力，没有使用一美元外汇的权力，何以实行校长负责制？又有什么责任可负呢？还不如把重点放在被教育部所忽视、但又十分重要的教学制度的改革上，踏踏实实地做一点有益的探索。

经济观察报：武汉大学的教学制度改革从何处入手？

刘道玉：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落后的教育体制。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教育改革的重点应是教学制度改革，基于这种认识，我从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开始。凡是提前修满学分和完成毕业论文的优秀者，准予提前毕业和攻读研究生。实行学分制后，学生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了，学生的自由选课也促进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

所谓插班生制，指的是凡达到了大专学历的其他大学的学生或社会青年，都可参加我校的一次特殊考核，符合要求者，允许直接插入我校相关专业三年级学习。通过插班，可以把那些非重点大学中最好的学生和自学成才的青年吸引到武大来。

经济观察报：插班生制度在当时还不合法吧？

刘道玉：报告送到了教育部，半年过去了，仍没有音讯。我亲自到教育部去汇报，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无先例，需要慎重，待研究后答复你们。”一等又是三个月，不得已，再次进京汇报。我陈述道：“改革就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应当

允许失败。何况试行插班生制度并不一定会失败，即使成不了材也不会出废品，难道统招的大学生个个都能成为人材吗？”经我这么诘问，教育部的负责人也觉得有道理，表示同意，但还需国家计委批准。我趁热打铁，径直找到国家计委，我的改革热情感动了计委负责官员，同意实验，招收的插班生纳入国家拨款和分配计划。

经济观察报：真是好事多磨呀。

刘道玉：插班生制度实施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招收的插班生数量不多，但是却点燃了广大社会青年求知的心灵之火，使他们看到在统一高考升学的制度以外，又有了一次升学的机会。实践证明，插班生制是一个先进的教学制度，本应得到普遍的推广。遗憾的是，除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效仿我们举办作家班以外，几乎所有的学校均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

经济观察报：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道玉：一方面，说明传统教育观念和教学制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要改变它决非易事；另一方面，在中国“大一统”的教育制度下，推行任何新制度或倡导某种新事物，必须自上而下通过行政指令。如果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人没有转变教育观念，没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不去发现和支持教育改革中的新事物，那么再好的新创举也只能是自生自灭了。就连首创插班生制度的武汉大学，由于人事的变更，在招收了三届插班生以后，插班生制的做法也越来越变味了。这就说明，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创新精神的人，如果人的教育观念不转变，那势必是穿新鞋走老

路。

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

经济观察报：武汉大学的哪项改革措施是最有争议的？

刘道玉：我们冲破了一个禁区，就是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这项改革，的确有些冒险，弄不好就会被扣上忽视政治的帽子，甚至会被斥之为办学方向错误。但是，我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当图形式，而应当重实教。政治辅导员制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实行的，规定每100个大学生配一名专职政治辅导员，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很明显，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触及，宁肯它流于形式。我从调查中发现，政治辅导员既不为学生欢迎，他们自己也不安心工作，是一支极不稳定的队伍。政治辅导员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业务好的不愿干，学习平庸的，在学生中没有威信，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前程担忧。有些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不安心工作，迫不得已靠发津贴来稳定。他们本身是这样的思想境界，那么对学生还有什么说服力呢？基于这种认识，1984年我宣布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同时开始试行导师制，这在全国是惟一的。

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于15世纪初实行的一种个别指导制度。实践已证明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这个制度，以它代替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一种稳定的、权威的、有效的学生管理制度。导师制最大的优点，是将

教书育人制度化，实现政治与业务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完美统一，因而它是一个符合教育规律的、有生命力的制度。

经济观察报：诸多改革措施是如何出台的？

刘道玉：有的是集体研究，有的是受到来自学生们建议的启发。例如，当时生物系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给我写了一封信，诉说他想当作家却被生物系录取的苦恼。因此，我们就推出了转学制度，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学习的解放运动”。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经济观察报：当时学生的思想还是非常活跃的。

刘道玉：可以说朝气蓬勃。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于是，他们一进校就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领域。因此，各个系的同学都去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交流各自的新鲜见闻，一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创建了“快乐学院”。它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社团——多学科讨论会，每个星期三的晚上开例会时，各个系的一些“不安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气氛热烈非凡。虽然他们讨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是声嘶力

竭，但他们却很快乐。

经济观察报：学校容忍了这些学生的“不务正业”。

刘道玉：“快乐学院”的成立，得益于武汉大学当时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那时的武汉大学被称为“解放区”，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大学生应当运用两个课堂进行学习，这就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前者是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后者是指课外的学术社团活动，每个学生必须至少要参加一个自己喜爱的学术社团，如果没有，那就应当去创建一个合乎自己需要的学术社团。这是学习成才的需要，是获得全面知识的需要，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学术社团，那就不能算是完全合格的学生。

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全校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浪淘石”、“樱花诗社”、“珞珈山”、“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读书俱乐部”等等。那时，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数不清的社团中，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当然，这个研究会决不是崇拜纳粹主义、崇拜希特勒，而是研究希特勒如何利用纳粹主义，研究如何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学术社团兴起的同时，武汉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刊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经济观察报：你进行改革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刘道玉：这些制度改革的理念有三点：第一，教学制度是为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服务的，因此，必须把教学制度的改革作为中心任务来抓；第二，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没有自由民主的和宽松的校园文化，就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第三，应当尊重学生的志趣和选择权，允许学生自由听课，自由选择专业和系科，自由组织社团，自由进行课余科学研究。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做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他宣布这个规定后，不但没有逃课者，而且堂堂爆满。正是由于我们采取了这些开明和宽松的政策，那时学生们学得生动活泼，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至今对那种学习生活仍难于忘怀。

经济观察报：但对自由问题，直到今天许多大学的管理者仍然持有不同意见。

刘道玉：当年更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地区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学在鬃，吃在鬃，玩在武大。”这个顺口溜传得很广，不仅校内，在社会上也有传说，在一些不明真情的人看来，武汉大学似乎是学风不严、纪律松弛、误人子

弟的学校。对于流传的顺口溜，我并不在意，也从未动摇我改革的决心。其实，对于“玩”要作具体的分析，看是什么性质的玩，如果是花天酒地玩物丧志的玩，那当然是要杜绝的，而“玩学”，即在玩中学，在玩中增长才干，则是应当提倡的。从这种意义上，“玩在武大”就不是贬义的了，这正是武汉大学多年教学改革营造的新的学习风尚。那时，我校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如果说自由、民主的学习环境是“快乐学院”，那么 20 世纪 80 年代的武汉大学，就是一所“快乐学院”。事实证明，这样的学院，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是发明创造的温床。实践证明，80 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

我为改革而无怨无悔

经济观察报：当时的媒体赞扬武汉大学是“高校中的深圳”。

刘道玉：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它意味着自由、民主、开放，象征着高速度和高效益。当时武汉大学自由民主的风气很浓厚，开创了该校自解放以后最好的时期，无论是教学还是科学研究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时北京大学等名校的一些教授要求来武大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校的部分优秀学生办了转学手续来到武汉大学。

经济观察报：作为改革者，你的处

境如何？遇到了哪些压力？压力来自哪里？

刘道玉：改革当然有阻力，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下面的也有来自上面的。我认为，来自群众中的不同意见是正常的，通过做工作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来自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和指责，无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于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来说，是屈服于上级的压力放弃改革抑或是知难而进呢？我自觉地选择了后者，坚持走自己认定的改革道路。为此，我曾经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三次面对面的辩论：一次是关于学分制，二是关于取消政治辅导员，三是关于培养创造性人才问题。

我这个人一生不为君王唱赞歌，愿为坚持真理说真话。就这个性格，你不喜欢，我还是我。在辩论中，我有理不让人，虽然真理在我这一边，却也为后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除我的校长职务埋下了祸根。

经济观察报：你被免职以后，《中国青年报》发过一个新闻，导语写得非常耐人寻味，“58 岁的数学教授接替 54 岁的化学教授担任校长，武汉大学顺利完成新老交替。”

刘道玉：这是 1988 年 3 月 10 日《中国青年报》头版中间位置发表的新闻，里面还说“据有关负责人透露，这次调整属正常换届”。据我所知，教育部曾经派人去做报社的工作，希望这个消息不要发。当时的总编辑说，如果你不让发，我们就开天窗。所以那篇报道最终还是发了，很多大学都把这篇新闻作为新闻教学案例。

那一年春节没有下雪，春节以后下大

雪，非常大的雪。新操场右边一棵 300 年的大樟树突然倒了，连根都拔起来了。学生们借此发挥说，珞珈山的“大树”倒了。

经济观察报：据说几所大学邀请你去担任领导职务，既然你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为什么又拒不复出呢？

刘道玉：我不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位，而是想找到一块允许我进行改革的实验田，既然不允许我在武大搞教育改革，那么也就仍有人不允许我在其他学校搞改革实验。

2005 年我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出版后，我的学生开了个小范围的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学生说了三句话：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改革是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历史终究沿着改革者开辟的道路前进。我说“知我者我生也”。作为一个改革个体来讲可能是悲剧，但是你所倡导的、你所追求的可能就是历史所追求的。

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经济观察报：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呼吁大学改革回到 1985 年的原点，从 1985 年再出发。

刘道玉：1985 年 5 月在友谊宾馆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我以武大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参加的人中部分是大学校长，还有国家各部委主管教育的副部长、教育司的司长，各省市的主管教育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教育厅局长以及各方面的代表 600 多人。

经济观察报：会议是什么部门主持的？

刘道玉：国家教育部和国家体改委，开了一个礼拜。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了，如果现在把 1985 年教育体制改革文件拿出来做一个考题，现在教育部的官员和大学校长恐怕都考不及格。1985 年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么一份权威的教育改革纲领。我们那时候学习这个决定，反复地阅读，反复的勾划、圈点。我现在记忆犹新的一段话是：“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教学改革不是以创收多少来衡量的，是以培养人才来衡量的，偏离这个方向就错了。

经济观察报：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有针对性。

刘道玉：现在大学为什么迷失了方向？就是因为偏离了改革的方向，没有抓住提高民族素质这一条，而是被金钱迷惑了。当时制订改革方案的人没有私心杂念，都是很纯正的，就是想搞好中国的教育。现在有些人存了很多不健康的私心杂念，他们就相信一个字“钱”，而我就相信两个字——改革。

经济观察报：今天很多教育问题，都和当初改革的要求背道而驰。

刘道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反复强调，“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要系统的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



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精减机构和相应的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要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宜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试问:这些现在的大学做到了吗?

经济观察报:有些大学校长反映,这些年教育行政部门权力更大更集中了。各种评估把学校捆得死死的。

刘道玉: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哪怕是个科长下来,校长们都得必恭必敬地陪吃陪喝。因为他掌握了分配、评估、给项目,怠慢了他,你要倒霉啊。

现在教育部管辖的直属大学越来越多。文革以前是23所,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是34所,现在是76所。而且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比如说招生指标的分配、统一考试的命题、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优秀教师的评定、学校的评估、科研经费的分配,等等。另外,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工程”是越来越多。据我粗略统计,就有几十个“工程”。什么叫“工程”?“工程”本来是指国家某些重大的建设项目,“工程”用到学校上面本身就是一种炒作,而且花样翻新、不厌其烦地推出一个又一个“工程”。姑且不谈这些“工程”前后的重复,许多“工程”到最后又成了不了了之的“烂尾工程”。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30周年了,作为一个亲身参与改革者,你如何看待这30年中的教育改革?

刘道玉:中国教育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0年,大概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主要是拨乱反正,使教育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第二阶段从1981年到1988年,有七八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真正改革的黄金时代,真正的是在改革上下功夫。那个时候中央号召改革,广大教育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改革。上下结合,没有分歧。那些被戴上“臭老九”帽子的知识分子,一旦摘掉了帽子之后,他们的心情该是多么的舒畅!他们焕发出了青春,那时候一致的口号就是“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们为什么拥护解放思想,为什么拥护改革,就是出于他们真实的愿望。

经济观察报:我们很难想像当时改革的氛围。

刘道玉:就像“满园春色关不住”,也真有“百花齐放”的气氛。那时既有改革代表人物,也有典型经验。如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他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是个老革命,人很开明,主要抓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还有华中工学院的院长朱九思,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到了延安。1952年从《湖南日报》调到武汉筹办华中工学院,一直搞教育。文革期间他收留了全国各地被批斗、被扫地出门的专家教授六百多名,为改革开放后华工的大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他在实践中成为一位著名的革命化的职业院校校长。还有深圳大学的罗微启,提出党政体制改革,实行校长负责制。

经济观察报：第三个阶段呢？

刘道玉：从1989年以后到1992年，教育体制改革根本没有执行，这是教育改革完全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左倾思想抬头，派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专家到国外作报告，动员留学生回国，提出增加政治学习时间，禁止留学生出国，大学毕业生下放到劳动，这都是文革以前、文革中间的做法。而从1992年一直到今天，是第四阶段，以发展代改革。

经济观察报：以发展代改革，而不是以改革促发展。

刘道玉：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期间，我们不是通过改革传统教育观念和旧体制来促进教育发展，而是通过发展来带动改革，其结果必然使改革滞后。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些，这正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些认为教育形势大好、“教育改革成功论”者，就是看热闹的外行。他们说改革成功有两条标准：一是“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85%都实现了，另一个是我们现在大学也大众化了。这两条又涵盖了什么样的改革内容呢？不能说这几年教育没有发展，现在大学教育已经是实行大众化了，2006年达到22%，像美国、欧洲国家，大学教育大众化一般都要30年到50年，我们只用了8年。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这是改革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以发展代替改革，而不是促改革，是以牺牲质量来换的数量发展，掩盖了教育的很多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高速发展过程中，表面的繁荣实际上掩盖了很多问题，所

以这两年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刘道玉：对。发展和改革的区别在哪里？发展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原来的规模上向前推进；改革的本质是针对原有存在的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体制、新的制度、新的方法代替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制度、旧的方法，这才叫改革。请问“教育改革成功论”者，现在对教育的管理理念改了没改，管理方法改了没改，制度改了没有，特别体制改了没有？

经济观察报：恐怕没有改。

刘道玉：这就是以发展代替了改革，以牺牲质量换来了数量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在教育当局的官员和民众认识上的巨大反差？第一，一些人是从官本位出发，从官员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而不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第二，他们不调查研究，不听取群众的意见，采取了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的态度；第三，有些人不懂教育，而且不懂装懂。你虽然掌握了教育的权力，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掌握了真理。不能只相信领导的高明，不相信办学者智慧。不能只相信计划经济的控制力量，不相信市场的调节力量。

经济观察报：改革就是对既得利益的调整，是很难的。

刘道玉：为什么我一直呼吁要把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我认为体制问题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是制约人们思想、妨碍人们解放思想的一个桎梏。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大致是先后进行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走向现代化，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不成功，没有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因为

日本的体制改革很彻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

中国现在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而不是小敲小打的改良。什么是真

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呢？就是要放弃“大一统”教育领导体制，转变领导职能，实行大教育小政府，赋予大学真正独立自主的权力，实行教育家治校，发扬大学自由民主的精神。

<http://www.rednet.cn> 2008-3-3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作者：刘道玉

2009-02-25 19:37:47

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说：“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

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都看到了，就是教育领导当局看不到。这验证了一句古谚：“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愿为教育领导当局解谜，希望他们听进些逆耳忠言，并付诸整改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合并，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大操大办的序幕。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运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

也有改善。到2007年，大学生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

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越演越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一次高速大发展或大破坏之后，一般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这符合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可是，近20年的高等教育一直以火箭的速度上升，从没有进行过调整或整顿，根本谈不上巩固和提高。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提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真诚希望国家高层做出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极而言之，自学考试已成为“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自学方式自古就有，但是把它正式作为获取大学文凭的制度，是从1978年后才开始的。它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时大学生毛入学率很低，全国平均只有1.4%，不少省市还低于1%。扩大招生，又受到校舍等教学资源的掣肘。于是，自学考试被当作统一高考之外，另一条获得大专文凭的渠道

自学考试于1981年开始试点，1983年全面推广，直至发展到被称为中国的“第一考”。三十年来，累计4800万人参考，850万人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无可否认，在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考试满足了很多人的愿望，其中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它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

但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非昔比，全国平均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不少省市已达到高教普及阶段，广东省2009年将达到78%。有鉴于此，我认为高等自学考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似应取消这种制度，具体原因有三：一是自2006年开始，自学考试连年减少，逐渐出现了萎缩现象。二是自学考试仍然沿袭了普通学历教育，助长了唯学历论，除具有学历统计的意义外，并不能达到真正提高人们技术和能力的目的。而且，许多人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完全不搭界，什么容易就拿什么文凭，造成了某些文凭泛滥。三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舞弊现象严重，文凭水分很大。有人甚至极而言之，

自学考试是“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总之，取消自学考试制度，是整肃高等教育学风的需要，是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约30%，而我国基本上为零淘汰，官员和老板考博拿学位，一路绿灯

本来，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这是世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通则，直到1980年代末，我国也依然恪守着这个宗旨。

到了1990年代初，研究生急剧膨胀，官员和老板也涌进了校园争戴博士帽。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为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为数不少的老板和官员，既不上课又不做实验或查阅文献，怎么能够达到博士水准的要求？有不少老板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多么大！在职博士生已经异化和玷污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鉴于我国在职研究生太滥，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必须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属于纯粹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的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 1 至 2 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变味,以至出现了烹饪博士。目前,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 365 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 253 所。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等,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不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是用搞运动的方法,靠公关和打攻坚战,用高薪挖院士而获得的。有的甚至请省市的领导出面公关。一旦获得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就大肆宣传,开庆祝大会,奖励有关人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采取了这些不正当手段,某些新建的城市大学也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点几乎覆盖了大学的所有专业。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学位授予点进行整顿,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所,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

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学乱串位,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独立学院名不副实,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

1995 年民办四川电影艺术进修学院与四川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四川师范大学电影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二级学院或独立学院。到 2008 年 5 月,全国共有独立学院 326 所,分布在全国 30 个省份。

一般来说,办二级学院的大都是进入 211 工程的重点大学,甚至有的重点大学办了两所二级学院。其实,无论是叫二级学院或是独立学院,都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吧,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而绝非像教育部负责人所说的“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大学的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重点大学决不能做这种降格以求的事,必须尽快与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

成人教育发源于英国,它是适应英国的产业革命需要而诞生的,已经历了二百



多年的历史。英国被誉为“继续教育之乡”，对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成人教育始于 20 世纪初，以成人简易识字为对象。近一个世纪，虽然形式不断变化，基本上还是体现了成人的特点。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开始，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但并没以成人为教育对象。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然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体现的是“文凭至上”。因此，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既干扰了重点大学的职能，又没有履行成人教育真正的职责，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须进行整顿或调整。具体做法是，把现在大学中的成人教育学院与大学脱钩，通过调整和合并，按地区或省市建立若干所独立的成人职业学院或成人继续教育学院。这类学院不能担负普通大学学历教育，只能进行职业或职业更新再培训的教育。这绝非普通大学的教师所能胜任，设置职业性的专业，要由具有真正职业专长的内行担任教师，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停止大学办分校

办分校，往往是商业炒作，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

1960 年代，在备战的形势下，不少大学都办了分校，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虽然国外某些大学也有分校，但它们都完全独立，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各分校。

自 21 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在全国建七八个。顾名思义，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要有研究实验室，配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承担和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现在某些大学在各地建立的研究院是什么货色？据我所知，是依托各地的校友会挂个研究院的牌子，基本上是培训和卖文凭赚钱，或者就是学校的接待站。这种做法，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实行教授定编制

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

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碍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 1950 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画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衔头，不下真功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这方面，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有鉴于此，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实行首席教授制或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近传闻，教育部准备取消教授职称，实行教师 13 等级制。这并不能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只不过是级别代替职称而已。同时，教授职称已是国

际通行的做法，取消教授职称不利于国际交流。在 1950 年代，大学里的一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了，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官本位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剽窃抄袭见光死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虽然公开学术造假是个别的，但学风浮躁和浮夸却很普遍，至于“假项目”、“假论证”、“造假论文”、答辩走过场更常见了。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呢？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出版社和学报，任何人都可以出书，有多少有价值？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因此，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这有利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大少爷作风流行，谁都配车，装修一味向公司老板看齐，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我国大学 2500 亿的债务是怎样造成的？不客气地说，就是由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和大建楼堂馆所造成，铺张浪费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大学当局不愿承认。一些大学，建五星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等，被媒体逐一曝光。原有的楼房可以使用，也要建新的，一些系科本可以共用一栋楼房，非要单独建大楼，地下停车场、娱乐设施还一应俱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甚至连已退休的副部级的书记、校长仍然配专车，一些部处长明不配暗配，公车私用是普遍的现象。

现在，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应当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抓住了这些方面，就可以提纲挈领地带动各方面的整顿。要巩固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准，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排除万难，把整顿工作进行到底！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24467/1>